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结束 决定成立特别检察院和特别法庭 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任命黄火青兼特别检察院厅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五届人大常委会今天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人大常委会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院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会议决定，特别法庭公开进行审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派代表参加旁听。

这个决定是在今天下午结束的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通过的。

今天的会议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主持。会议还通过了《国务

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批准了康克清代表我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会议通过了任免事项，任命魏文涛为林业部部长，免去罗玉川的林业部部长职务。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谭震林、彭冲、赛福鼎、廖承志、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肖劲光、朱蘅山、史良、习仲勋、杨尚昆，出席了今天的全体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列席了会议。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今天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全文如下：

鉴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特别重大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一、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

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院厅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列席了会议。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今天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全文如下：

鉴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特别重大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一、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

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院厅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列席了会议。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庄严的决定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检察起诉和公开审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这个庄严的决定，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必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施展种种阴谋诡计，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篡夺国权，祸国殃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概括起来，一是煽动、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夺军权；三是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四是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深入开展的揭批查运动，把他们的罪行越来越充分地揭露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又组织力量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审查，大量事实证明他们严重触犯了刑律。他们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他们的罪行给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造成的灾难难以估计。广大群众早就强烈要求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依法治罪，这是完全正当、完全合理的。现在人大常委会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实在大得人心。对这样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如果不依法惩处，公理何在？国法何在？何以伸张正义，平民愤？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确实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但是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犯错误的问题，而是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的问题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截然不同；同任何一个同志犯的工作上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性质也截然不同。他们是一伙篡党窃国大盗，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刑律，理所当然地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次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只审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不涉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这样做，十分正确。因为反革命罪行是敌我问题，工作中的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必须严格区分，不容许把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搅在一起。只审判林彪、江青一伙的罪行，不涉及工作中的错误，更可以充分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使他们无法逃脱自己的罪责。把犯罪和犯错误区别开来，我们党历来都是这样做的，即使对于犯严重路线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人，也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蓄意混淆犯罪和犯错误的界限，把干部在工作中的错误，甚至他们捏造的“错误”，诬陷为反革命，搞成敌我矛盾，造成了严重危害。现在我们恢复党的传统，严格区分犯罪和犯错误的界限，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和现实意义。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十分注意加强民主和法制。我们努力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努力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加强立法和司法工作。这次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就严格依法办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作了大量的工作。移交司法机关以后，在侦查预审和检察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又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罪行，依据的都是经过检验的原始书证材料和原始物证，如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录音等。刑事訴訟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司法部门正是根据这个原则进行行事的。这一重大案件的公开审判，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人民关注这件事情，全世界关注这件事情。通过审判，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大白于天下，将更加激起亿万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激发人们作出更大的努力挽回这一伙反革命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这次审判将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我们国家将更加安定团结，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沿着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

社论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检察起诉和公开审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这个庄严的决定，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必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施展种种阴谋诡计，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篡夺国权，祸国殃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概括起来，一是煽动、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夺军权；三是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四是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深入开展的揭批查运动，把他们的罪行越来越充分地揭露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又组织力量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审查，大量事实证明他们严重触犯了刑律。他们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他们的罪行给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造成的灾难难以估计。广大群众早就强烈要求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依法治罪，这是完全正当、完全合理的。现在人大常委会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实在大得人心。对这样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如果不依法惩处，公理何在？国法何在？何以伸张正义，平民愤？

庄严的决定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检察起诉和公开审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这个庄严的决定，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必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施展种种阴谋诡计，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篡夺国权，祸国殃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概括起来，一是煽动、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夺军权；三是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四是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深入开展的揭批查运动，把他们的罪行越来越充分地揭露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又组织力量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审查，大量事实证明他们严重触犯了刑律。他们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他们的罪行给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造成的灾难难以估计。广大群众早就强烈要求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依法治罪，这是完全正当、完全合理的。现在人大常委会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实在大得人心。对这样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如果不依法惩处，公理何在？国法何在？何以伸张正义，平民愤？

社论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检察起诉和公开审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这个庄严的决定，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必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施展种种阴谋诡计，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篡夺国权，祸国殃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概括起来，一是煽动、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夺军权；三是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四是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深入开展的揭批查运动，把他们的罪行越来越充分地揭露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又组织力量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审查，大量事实证明他们严重触犯了刑律。他们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他们的罪行给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人民造成的灾难难以估计。广大群众早就强烈要求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依法治罪，这是完全正当、完全合理的。现在人大常委会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实在大得人心。对这样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如果不依法惩处，公理何在？国法何在？何以伸张正义，平民愤？

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

会议决定设立秘书处；邓小平在会上说，在广泛征求意见

和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好章程的修改工作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委员会今天下午在政协礼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章程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章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一届会议，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届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当时的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代替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任务，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并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在这一年的12月，二届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以此作为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遵守的准则。这个章程一直到十年浩劫以前都是执行得比较好的，在推动人民政协的工作、活跃国家政治生活、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人民政协的活动陷于停顿。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拨乱反正，1978年2月，召开了五届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了1954年的章程。修改后的章程，对于恢复、重建人民政协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章程有些内容有明显的错误，有些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使

得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方针、基本政策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这些发展和变化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在现行的章程中得到反映。因此，修改章程已经成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迫切任务，五届人民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对它进行全面的修改，是完全必要的。

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人民政协应当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各族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经验，使实践中证明是有益的东西，在修改后的章程中得到反映。

邓小平说，修改章程，要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采取各种形式征求全体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方面代表人士以及地方政协的意见，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好章程的修改工作。修改草案要提请五届人民政协下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为了有利于这一紧迫工作的进行，建议在章程修改委员会的领导下，设立秘书处，负责进行具体组织起草的工作，及时地向委员会报告请示。

邓小平说，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修改后的章程，在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之后，我们的政协，一定能够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会议决定设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并通过了负责工作人员名单：

顾问：李维汉；
秘书长：刘宁一；
副秘书长：孙起孟、孙晓村、李琦、雷洁琼、熊复、孙承佩、吴江、高天、李霄路。

会议由章程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澜涛主持。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教育部报告强调指出

各地各部队各部门及早退还占用校舍

要求占用校舍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起模范带头作用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9月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进展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地各部队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认真研究执行。

教育部在报告中说，当前教育事业发展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困难是校舍严重不足。特别是高等学校，由于明年只有毕业生十万余人，即使招生仍然维持27万人，在校学生也将猛增17万人，需要相应增加校舍近600万平方米。现在距明年秋季开学仅有一年时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已十分紧迫。

报告说，根据1978年5月底统计，全国被占用的校舍共有一千六百六十一万余平方米，其中高等学校为四百六十二万余平方米。1978年8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以来，已退还280余万平方米，为全部被占校舍的16%；其中高等学校已退还约110余万平方米，为被占校舍的24%。两年

来，江西、安徽两省退还较快，已分别退还48%和44%，河南省已退还32%，

湖北、黑龙江、吉林三省也已退还20%以上。但是，从全国来看，退还校舍的工作进展很不平衡，多数省、市、自治区退还校舍的数量较少，有的至今一平方米也未退还，目前全国尚未退还的校舍仍有1,480余万平方米，其中高等学校约占350万平方米。

报告指出，江西、安徽两省和一些地、县退还校舍进度较快的主要经验是：领导重视，负责同志亲自抓；党政领导机关带头退还；切实解决退还校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报告强调，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和部队领导机关要充分认识重视这项工作，并参照江西、安徽等的经验，切实抓好，特别是占用校舍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更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

华国锋会见乔纳总书记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迈因扎·乔纳一行。

华国锋首先对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赞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发展得很好，我们感到满意。我们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相帮助的友好关系。他表示深信，乔纳总书记的这次访问必将对进一步加强中赞两党和两国的友谊与合作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李先念会见宴请基督教社会党代表团 胡耀邦拜会费尔南德斯总书记等贵宾

的国家，我们的共同语言是很多的。他说，我们赞赏委内瑞拉收回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赞赏委内瑞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谴责美国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侵略，反对美国在柬埔寨推行独立自主的国际政策。我们反对损害我们主权的霸权图谋。我们主张在社会正义、而不是在富国剥削穷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他列举了引起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因素，并且指出，为了维护国际形势的稳定，坚决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各国人民和政府要共同做出努力。

费尔南德斯等委内瑞拉贵宾今天下午由张致祥陪同游览了故宫。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上午到钓鱼台宾馆，拜会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总书记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和夫人以及由费尔南德斯率领的基督教社会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

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向客人表示热烈欢迎。费尔南德斯说，我们受中共中央邀请来中国访问，感到很荣幸。胡耀邦说，你们党和我们党在国际事务中有许多共同语言，两国

之间的经济交往有着广阔的前景。费尔南德斯表示同意，他说，双方的确有许多共同点，我们盼望同中国领导人行进会谈，相信会谈一定会富有成果。

会见之后，两位总书记单独进行了交谈。

首次来我国访问的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代表团，分别于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代表团成员中有基督教社会党副主席海德·卡斯蒂略·德·洛佩斯。基督教社会党目前是在委内瑞拉的执政党。代表团将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发展两党、两国关系以及当前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到机场迎接代表团和拜会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致祥等。

多发展一些两年制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省教育厅 方 华

高等教育应该是多种类型、多种学制。二、三年制的专科，四、五年制的本科，大学毕业后再读几年的研究生，由这几档所组成的高等教育的多级结构，能够培养出各种不同水平的专业人才，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但目前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高等专科学校特别是工、农科高等专科学校，被严重忽视了。到1979年底，全国共有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661所，其中工、农科高等专科学校26所，仅占4%。山东省13所工、农科高等学校中，全是四年制本科。这些学校1979年在学生15,130人，其中四年制本科学生14,964人，占99%。附设在大学的三年制专修班学生39人，两年制专修班学生127人，仅占1%。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山东省共设工、农科高等学校17所，其中高等专科学校就有9所，加上四年制大学附设的专科部，专科学历占50%左右。这种比例，比较适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十年浩劫之后，这几年我们不重视恢复与发展专科学校，致使本科的比例严重失调。

从60年代起，许多国家特别注意发展两年制的短期技术大学。法国1966年由政府命令创办这种两年制的短期技术大学，目前已有66所，分布在全国56个大城市。日本在1977年，两年制短期技术大学已有511所，学生近40万。美国早在70年代初期，这种两年制的学院就有一千多所，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1960—1976年间，两年制大学学生数从45万增至260万。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发展两年制高等专科学校，是我国四化

建设的迫切需要。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更多的大专毕业生水平的各类专门技术人才。而各行各业需要的技术人才，只有构成合理、搭配得当、因才使用，才能充分发挥潜力。因为各行各业的技术工作，是由不同水平的技术人员相互配合来完成的，既需要一部分高级科研人员，也需要一部分设计和工艺人员，更需要大量的使用、管理和维修人员。这些不同水平的技术人员，分别由高等学校的研究班、本科、专科和中专培养，才是最经济合理的。从山东省四化建设的人才需求情况看，对高等专科学校提出的需要是相当大的。全省县属以上的企业有五千九百多个，其中大、中型企业203个，小型企业五千七百多个。因为这些企业绝大多数以生产定型产品为主，很少自行设计和研究新产品，大量需要的是制造、工艺和维修人员。这些技术人员，大部分可由两年制的高等专科学校培养。

当前，多发展一些两年制高等专科学校，也完全有可能。特别是财政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两年制高等专科学校的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前景。第一，业务部门和地区办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已经开始把人才的培养和本科系统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紧密联系起来，把办好高等专科学校，培养合格人才，看作是实现四化的支柱。昌潍地区计委一位副主任说，有了有水平的技术工人，产品质量才会提高，在市场上才会有竞争能力。如果不抓人才培养，有些工厂产品就不过关，在市场上无销路，厂子也得倒闭。他们积极要求创办高等工业专科学校。还有十几个业

务厅、局和地区，也要求新建两年制高等专科学校。第二，财政经济体制改革后，业务部门和工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在办学上有经济实力和专业优势。我省已有不少业务厅、局，提供相当的人力、物力支持高等学校的发展。1979年省属工农科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投资是313万元，而有关业务厅局又另外投资400万元。第三，两年制高等专科学校的设置，可适应本行业本地区的急需，发挥本行业本地区的专业特长。专业课师资可以由企业和业务部门解决。如果在教学上再取得一些老校的支持，质量也会有一定保证。

如何才能使两年制高等专科学校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要从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扫除发展这类学校的障碍。创办这类学校的审批权完全可以给省市；学校经费是谁办的谁管，并给这些办学单位以必要的主权。在毕业生分配上，要优先照顾到主管部门的需要。如果只出钱而不得实施，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应允许他们根据本行业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长，设置他们急需的专业。其次是要多种形式办学。从山东省情况看，至少有三种，一是由业务部门和地区创办独立的两年制高等专科学校。1985年前，我省准备新建几所，1990年前再发展一批。二是由现有大学和有关业务部门或地区联合创办。山东工学院正与工业基础较好的烟台地区协商，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工业专科学校。这种方式，大学可以发挥师资方面的优势，地区可以发挥他们的经济优势，扬长避短，两相结合，促进发展。三是在四年制普通大学内设立专科部。山东省有几所四年制大学，准备创造条件，或设立专科部，或某些专业招收两年制的专生，以扩大招生能力，培养更多技术人才。



退还校舍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1978年、1979年两次下达文件，指示各地各部门退还占用校舍之后，最近又联合发出文件，再次要求有关单位采取切实措施，及早退还校舍。这说明党和国家是非常重视教育事业，非常重视退还校舍工作的。同时也说明，退还校舍的工作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问题不少，阻力甚多，需要做艰苦、深入的工作。

大量校舍被占用，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教育战线目前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既不利于发展教育事业，为四化培养人才，又不利于发展经济。必须本着实事求是、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教育事业、有利于加强团结的原则，作出通盘安排，把这件事及早办好。

及早办好退还校舍的工作，关键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首先是用单位数和被占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要有积极的态度，认真解决占用和被占双方的实际困难。退还校舍工作不仅是占用、被占双方的事，也涉及到其他方面，要作出通盘安排。因此，主管部门的领导要克服官僚主义，主动出来协调解决。一般表态不行，光画圈也不行，要亲自动手去调查研究。很多事例证明，有些被占校舍之所以迟迟不能退还，问题还是在主管部门的领导那里。不能把事情推给当事人的双方，主管的领导不出来解决，结果矛盾激化了，再来指责责任方的事情。这决不是积极的态度。

抱积极的态度，就要订出退还校舍的期限，并且信守。实践证明，凡是退得比较快的单位，都订出了明确的、尽可能短的期限，并信守诺言按期退还。退得慢或根本不退还的单位，总是没有、或不愿意订出明确的期限，有的甚至在占用的校舍中继续抢建，企图造成永远占用的既成事实，然后以此为理由拒不退还。这决不是积极的态度。

当前，发展教育事业的一个突出困难是校舍严重不足，特别是高等学校，由于校舍被占，很多院校只能招少量的学生甚至无法招生。校舍不足和被占，已严重影响到四化建设人才的培养。明年全国高等学校只有十万余名学生毕业，即使明年招生仍然维持27万人，在校学生也将增加17万人，需要相应增加近600万平方米校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退还被占用的校舍，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



前几
中央
金融
学校
（以下
称烟厂）
在报上
刊出紧
要通
知，要
求今年
的新生
延期报
到，原
因是北
京卷烟
厂（以
下称烟
厂）没
有退还
校舍。

新生
不能入
学，校
舍何时
退还？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记者访问了学校、工厂以及双方的有关领导部门和领导同志。

原来，财院自1978年在原址复校以来，烟厂和其它单位只退还校舍7,300平方米（占原校舍44,100平方米的16.6%）。由于校舍有限，两年才招收学生388名。

我们来到了财院，一进大门，“迎接”我们的是轰鸣的机器声和刺鼻的烟草味。用苇席盖着的数十个烟叶垛占据了整个操场，原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学生食堂、教工宿舍至今仍未由烟厂使用着。我们住进大院东北角找到一栋由财院使用的小楼。这是一座三层的宿舍楼，如今四百多名教职工的办公、备课、科研等活动都挤在一、二两层里。在昔日财院的校园里，教师们搭起了9个木板房当作教室。木板房之间立着两个显然不够距离的篮球架，这便是学生们唯一的体育活动场所。只有200平方米的原教工食堂，现在要容纳教工、学生及家属近千人就餐。没有图书馆、阅览室。

财院的学生和教职工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了两年多时间。他们等待着烟厂退还校舍。然而，去年，烟厂宁愿让一栋教学楼闲着，也没让学生到楼里去上课。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新建房子、安装设备，有长期安居之意。

其实，有关烟厂退还校舍问题，早在1978年之前，财政部负责人就曾同北京市负责人达成退还烟厂、陆续退还校舍的协议。国家计委、财政部1979年9月27日下达的有关文件指出“同意北京卷烟厂立即迁建”，“所需建设资金，由财政部按800万元”，“所需三大材料，请国家物资总局核拨”。随后有关单位还拟定了烟厂迁建方案，批复了烟厂迁建计划任务书。中央领导同志也三令五申，明确指出“让烟厂限期搬开”，“能迁出的房子立即让出”。

奇怪的是，烟厂就是按兵不动。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市后来又提出了一个态度模棱两可的另生枝节的报告，使退还校舍问题出现了新的困难。

多年来，由于不重视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已经造成了财政单位人才缺乏。目前，在财政系统工作的30万名财政干部中，大专毕业生只占2.9%。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财政体制的改革和外商合资企业的增加，急需培养大批具有财政管理能力的人才。而财院由于校舍被占，今年招收200名新生都无法入学。

当然，退还校舍会碰到许多困难和问题，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是不能办，而是为不办的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同志的决心和态度。

《光明日报》记者 唐 珊
《中国青年报》记者 梁 平
新华社记者 杨惠民 程万泉
（本报有删节）

本报讯 记者肖关根报道：历史悠久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经上海市有关部门批准复校，已于9月22日正式开学。经过考试，择优录取的979名学生开始了业余学习生活。学校设文书、会计、英语、日语、珠算、速记六科，学生有在职职工和待业青年，上课时间一般在星期日和晚上。

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是在8月27日开始招生的。青年们闻讯后纷纷前来报名，5天报名人数达4,285人。有个区的一位同志感慨地说：“我们区有40所业余学校，从未见过这种门庭若市的情景，有的学校还招不足学生。”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一不发文凭，二不负责分配工作，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来报考。”为了尽量满足青年们学习的愿望，学校不得不一再增加招生名额，最后录取了979名。

停办多年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所以受欢迎，除了这所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较有经验之外，主要是因为该校的各个专业符合当前的社会需要。近几年，大批老职工退休，接替的新职工多数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迫切要求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只有百分之几能升学，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但没有一技之长，还需经过职业训练才能从事实际工作；在经济调整中，出现了不少新的企事业单位，原有的企事业单位也

令人鼓舞发人深思 上海群众欢迎中华职业补校

要加强对经济核算和提高工作效率，这就要大量的中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而补习学校这种形式又很适合在职和待业青年的学习要求。

有位在郊区一家工厂工作的青年在信中说：“虽然我是老三届中之一，目前在国营工厂当厂级生产管理人员，但是在工作中深深感到缺少某些技能，影响工作，又苦于无处补习。这次你校设文三班，很实用。”一位在公司工作的青年认为，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各种专业比较细，虽然是中专性质，但较实用，学了几年以后马上能搞具体工作，所以深受各单位的欢迎。

青年工程师胡国华 研究设计成功现代光学实验系统

此这门学科的发展有着引人注目的前景。我国在现代光学方面的研究起步并不晚，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实验设备和资金，进展缓慢，因而拉大了和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这套实验系统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光学科研设备的一项空白，为缩短这一差距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胡国华研究设计的这套系统，结构简单、合理、操作方便，使用精度较高，具有通用性和多用途性，可与国外同类产品媲美，价格却只有它们的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可为我国科研和教学单位广泛采用。

最近，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宇航学会使用这种系统联合举办了全息照相和光学信息处理实验班，在实验班上，这一系统得到了科研和教学人员的很好评价。

胡国华今年37岁。这套实验系统主要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出来的。他的这一活动，得到了他的研究所、上级领导机关和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

本报 记者刘云莱报道：参加阿尔泰山自然景区综合保护区和河狸保护区科学考察的新疆各族科学工作者，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自然资源保护，拯救濒临灭绝的生物种群。

今年6月至8月，这些科学工作者在阿尔泰山自然景区综合保护区和河狸保护区进行了动植物、土壤、地质、气象等十个学科的考察，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我国稀有珍贵动物河狸的主要栖息地——布尔根河下游、普格里河及乌伦古河等流域的河滩森林，十多年来被砍伐60%左右。由于森林遭到破坏，河谷草场严重退化，水土得不到保持，河水流量锐减，鱼类等水产资源也急剧减少。以沿岸杨柳为主要食物的河狸，从



图为河狸保护区的森林被砍伐的情况。右上图是河狸。

考察新疆阿尔泰山自然保护区的科学工作者呼吁

保护自然资源 拯救珍稀动物

1965年到现在约减少90%，如再得不到保护，就有被灭绝的危险。

动物科学工作者指出，被国家列为保护对象的珍稀野生动物在新疆还有许多种，如野骆驼、野马、麝、雪豹、貂、大头羊、松鸡、雪鸡、天鹅、紫貂、石貂、扫雪、雪兔、雪鸡、黑熊、黑熊鸡等，其中有些种类

锁住流沙 开发沙漠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机械固沙与植物固沙相结合的办法治沙，包兰铁路避免沙害事故，沙地长起了庄稼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包兰铁路沙坡头地区建立研究站，用机械固沙和植物固沙相结合的办法治理流沙，使包兰铁路自1958年正式通车以来，从未因沙害发生事故。

包兰铁路从兰州到银川一段跨过腾格里沙漠，其中孟家湾到迎水桥一段长达16公里，沙丘起伏，危害最烈。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与铁道部固沙林场技术人员共同协作，采用机械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在这一地区进行固沙研究。他们在当地农民支持下，利

已为数不多。可是，现在不但得不到保护，甚至还被当作出口毛皮和野味动物收购。新疆每年收购的大约两百吨野生动物中就有

一些是上述珍贵动物。科研人员认为：这次他们初步考察了三百多种野生动物、八十多种珍稀植物和三百多种昆虫。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自然状态保持完好，是保存珍贵的生物种群、深入研究生态平衡、研究生物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比理想基地。

长几十公里的绿色屏障已经形成。最佳地区的植物覆盖率已达49%。随着植物种类的增加，蜥蜴、鼠类、各种鸟雀、兔子、野猫、狐狸、黄羊、刺猬等动物也在迅速增加，生态系统正朝着有利于人类的良性变化。防沙林绿化了铁路沿线，防止了风沙危害，保证列车顺利通行。

沙坡头沙漠科学研究所还对开发利用沙漠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和研究，总结出一套关于种植绿肥、施用泥炭和有机肥料以及引黄河水灌溉的改良利用措施。现在，研究站的试验地，种植了各种粮食、油料、经济作物和蔬菜。他们的工作不仅加强了我国沙漠学的基础理论，同时也为开发和治理沙漠提供了宝贵经验。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李安定报道：用于现代光学研究和教学的实验系统，由一位青年工程师胡国华研究设计成功。由他所在的北京环境特性研究所和江苏华光电子厂分别生产的15套装置，最近都已投入使用，性能良好。

这套叫做“全息照相和光学信息处理实验系统”的装置包括光源、防震台、光学和机械部件共六十多种装置，可以做全息照相、激光散斑、图像频谱分析、空间滤波、光学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几十项现代光学实验。这些实验是我国从事光学研究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普遍要进行的。目前这种系统只在美、苏等少数国家制造和使用。

全息照相和光学信息处理是60年代以来发展的新兴技术科学，是现代光学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应用十分广泛。例如，可以使模糊的卫星显微图像或卫星照片变得清晰，可以将一年的《人民日报》存储在一片80×80平方毫米面积的照相胶片上。光学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可能促使电子计算机速度快、容量大的光学计算机早日实现。因

能源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也不例外。解决能源问题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开源就是开发能源资源，节流就是节约使用能源。我国已确定现代化能源建设的总方针：能源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要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大力开展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结构改革。

(一)

能源是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物质基础。从世界来看，一个国家的产值和能源消费量大体上保持正比关系。也就是说，能源消费量越大，产品产量越多，社会也越富足。

世界的能源增长极为迅速。1960—1975年的15年间，世界能源消费相当于前60年的能源消费量；经济发展最快的日本，在1965—1975年的10年间，能源消费量等于前65年的能源消费量；1950年世界能源消费量仅27亿吨标准煤，目前约达100亿吨。按人口计算的平均能耗，世界每人每年只有2吨多，发达国家平均是5、6吨，其中美国最高，已超过了12吨。战后，以先进工业国家为主体大力推进现代化，是与大量使用能源，特别是中东的石油分不开的。70年代之后，世界能源形势日趋紧张，我国也是如此。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能源利用效率低，存在着很大的浪费，使供求关系更为紧张，已发展到了严重地步。它主要表现在：企业动力不足，开三停四屡见不鲜；城镇用电没有保证，经常拉闸停电；农村缺少柴炭，大部分农户还没有电。

据有关部门计算，工业缺电400多亿度，有20—30%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相当于影响700多亿元的产值。在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西方能源危机，即石油危机。当时，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减产幅度是5—25%，受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减少产值约10%。应当承认，我国由于能源短缺，也显著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能源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就无法前进，生活就难以改善。面对四个现代化，能源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日本认为，能源问题解决的好坏，是关系到民族生存的大事。依我看，我国能源问题解决的好坏，是关系到能否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十年浩劫期间使能源建设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新增生产能力不多，强化开采来增加能源不足。地质勘探跟不上，致使能源后备可采储量不足，煤炭采掘比和石油储采比失调，这些都有待恢复。所以，近期内能源增产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近几年只能维持目前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节约使用能源

杨志荣

生产水平或略有增加，但不会有突破性的增长。

另一方面，能源的建设周期比较长。无论是煤矿、水电站，还是火电站（包括煤矿）和核电站，一般要七至十年，要达到设计能力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着手安排的项目，短期内也不会见效。所以，在近期内，生产和生活的需求与能源的增产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能源的形势是紧迫的，必须在大力开发能源资源的同时，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

我们要十分抓紧能源的节约和合理使用，力争在不断增加能源消费的同时，使国民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过去两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显著成绩，有的地区和单位，甚至在减少能源消费的情况下，取得了较高的增产速度。去年全国节约了2,000多万吨标准煤，能源消耗只增长3%，却保证了工业产值增长8.5%，实现了节能又增产。实践证明，节能是缓和能源供应不足的好办法，它不但见效快，而且有利于减轻铁路运输的负担，减少能源给环境带来的公害，一举数得。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穷国。与发达国家比较，生产和生活水平差距甚大。要更快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在能源利用上必须精打细算，用比较少的能源，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我们预期的经济目标。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国外能源建设的好经验，又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绝不可盲目追求能源消耗的高指标。

(二)

节约能源既然如此重要和迫切，那么，究竟有多大潜力？这些潜力有多少可以变成现实可用的能源？

对一个国家来说，能源利用率是衡量这个国家能源利用好坏的一个综合性指标。从能源生产（不包括能源回采率）、加工转换、运输、贮存到最终使用的全效率，世界上还是很低的。日本是36.4%，西欧是32%，这就是说，大约有三分之二能源损失掉了。目前我国节能的能源利用率，它只反映了能源利用的一个主要环节。这个效率，日本是57%，美国是51%；我国是30%左右。从能源利用率效率来看，日本比我国高90%，美国比我国高70%，差距很大。我国农村能源的利用率只有10%，若考虑这一部分，差距则更大。

我国能源利用率究竟在什么地方？

按能源的用途，国外常把能源消费分为四大类：

发电、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和民用。我们也从这几

个方面来看一看我国能源的利用情况。

发电：工业发达国家，火力发电效率已达到35—40%，我国只有28%（包括小机组在内）。与发达国家比，差距是相当大的。

工业：能源在工业部门除用于发电和少量做原料外，大部分是直接燃烧和生產蒸汽。如整个冶金企业锅炉燃料占其总燃料消耗的三分之一以上；化工行业接近一半；轻工纺织占90%。但是，热效率都很低，比国外低得多。国外钢铁工业综合热效率在50—60%，我国目前只有28%；国外氮肥生产的热效率在50%左右，我国才25%，比国外相差一倍。

交通运输：美国、日本、西欧的汽车运输发达，铁路运输已经内燃化、电气化，能源利用效率在20—25%。我国主要是铁路运输，其中五分之四是蒸汽机车，效率只有6—8%。

商业和民用：国外城市和商业采暖，不少与工业用热配合，采取区域锅炉房或热电合供的办法，比我国分片小锅炉房和分散小锅炉采暖的效率得多。在炊事方面，国外尽量供应优质能源，大都是煤气或电力；我国除少数几个城市部分使用煤气外，基本上靠煤炭，而且质量较差。煤炉做饭热效率只有15—18%，煤气可达50—60%。国外农业口不多，基本上也使用油、电、电等优质能源，我国农村几乎全靠靠耕，采用古老的燃烧方式，热效率只有10%。

另外，再以三项主要工业产品的能耗情况为例。

钢铁：1979年我国平均吨钢可比能耗约1.6吨标准煤，日本为0.8吨，比日本高一倍。若以1979年钢产量3,448万吨计算，与日本相比，一年多消耗2,800万吨标准煤；

火力发电：日本供电煤耗335克，1979年我国供电煤耗（包括小机组在内）是474克，比日本高41%。若以1979年火力发电量计算，一年多消耗3,000多万吨标准煤；

合成氨：我国吨氨平均能耗1979年为2.84吨标准煤，日本是1.2吨，比日本高一倍多。若以1979年我国生产1,352万吨合成氨计算，一年多消耗2,200万吨标准煤。

仅上述三项主要工业产品，与日本相比，就多消耗了8,000万吨标准煤，占全年能源总消费量的13%以上。数量之大，十分惊人。

再以国内小氮肥批产情况来说，

我国合成氨的一半以上是小厂生产的，通过这

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

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这段话出自《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然而正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批评了那些把经济因素看作“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在同一封信里的两段话是否自相矛盾呢？不矛盾。因为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当前只有经济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历史进程时，就会看到历史总是在辩证运动中发展。有的同志指责决定论在社会发展中经济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承认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是二元论，那末，恩格斯否认在历史过程中经济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难道也是犯了二元论错误吗？

陈文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的典型表现，是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分析。他在批判我们坚持的观点时说：“这种看法是把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混为一谈了。一个是经济与政治这对矛盾本身双方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一个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对工作重点的抉择问题。”他承认“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究竟变革政治是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是首要的任务，当然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或改变的。”但是他又认为，“‘变革政治’与‘政治’，‘发展经济’与‘经济’，是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用变革政治与发展经济两者成为首要任务的讨论，来论证政治与经济矛盾双方何者起决定作用，从逻辑上说是违背同一律的。”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任何事物的作用，都是在事物的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在一定条件下的主导作用正是在政治的变革中表现出来的。其二，工作重点转化是否需要客观依据呢？如果把工作重点转化必须符合客观辩证法叫做违背逻辑上的同一律，那么人们不是可以说主观地确定工作重点了吗？这不是观点上似乎很坚持唯物论，实际上恰恰走向唯心论。陈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质变阶段，转折关头，“正是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时候。”应该说，这个论点是并不十分明确的，如果说这是指经济归根到底起着决定作用的，那么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是否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那就不仅不正确而且是很有害的。社会革命是由经济发展的要求决定的，但是当不变革政治，经济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政治就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即使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而经济只是作为根源，规定着政治

年的节能活动，能源消耗有所降低，但是大多数小厂的能耗仍然很高。今年一季度，全国小合成氨厂的吨氨能耗平均是3,176公斤标准煤，浙江62个小厂能耗平均是2,291公斤。若按今年计划产量750万吨计算，与浙江相比，就要多消耗能源600多万吨标准煤。

总之，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国内同行业相比，节能的潜力确实是很大的。正确地估计节能潜力，对我国今后的能源建设十分重要。估计过低，就会忽视节能的作用，限制节能潜力的发挥；估计过高，就会过分依赖节能，放松能源开发的努力。

既然我国节能潜力很大，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可用的能源？

日本是世界公认能源利用最好的国家，能源危机之后非常重视节能。与1973年相比，1974—1977年的4年间，平均每年的节能率为5.5%。据我国有关部门估算，去年全国节能2,360万吨标准煤。按照这个数字，节能率是4%，接近日本节能率。

然而大规模的节能活动我国刚刚开始，这几年我们扫了一批“浮财”，关、停、并、转了一批“煤老虎”、“电老虎”、“油老虎”等等，节能节约量比较大是肯定的。但是，应当认识到，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节能难度将越来越大。比如消耗1亿吨标准煤，利用效率在25%时，再提高1%的效率，节能率是4%，可节约400万吨；利用效率在30%时，再提高1%，节能率是3.3%，可节约330万吨；利用效率若在40%时，再提高1%，节能率下降到2.5%，只能节约250万吨。也就是说，随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节能率将会下降。不仅理上是这样，实际情况也开始显露出来。如我国冶金系统钢铁企业，1978年节能率为14.33%，1979年是9.5%，1980年计划3.5%。其他行业也有类似情况，这种趋势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尤其，节能与开源不同，具有广泛分散的特点，牵扯到各行各业，涉及到千家万户。要积少成多，汇流成川，使节能发挥效力，非要花大力气去实施不可。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所需要的能源，与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相差4亿吨标准煤，必须靠开源来填补。特别近十年，每年要节约2,000万吨，开源大也在这个水平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要靠节能来取得，否则，就达不到预定的经济目标。

节约能源，要靠强大的科学技术，要求有比较完善的管理方法和体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还要有一大批现代科学技术队伍和精干的管理人员，从实际情况出发，讲究实效，力求以最小的能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以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变革的方向、内容等等。如果按照陈领导的

的观点，这当然是不对，例如当时陈领导的十月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政治的最高行动即革命不是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倒是经济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表现得特别突出；当“四人帮”在加紧篡夺政权，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时候，粉粹“四人帮”这个政治不是转过来对经济的发展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相反的在这个时候经济的作用却是特别突出？这种看法势必得出经济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的结论，而这就必然导致否认政治革命必要性的自乱阵线。

陈文还提出：“否定经济与政治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相互转化，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吗？”他作了否定的回答，理由是历史上的机械唯物论者，在历史领域内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根本没有达到辩证政治政治高度的认识高度，因此，所谓是否承认一定条件下政治决定经济，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无从谈起。”我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的。通常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机械唯物论的见解，并不是对历史上的旧唯物主义者说的，而是指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里所谓机械，即指僵化，否认转化。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的机械唯物论者在历史领域里都是唯心主义者，就认定后来的人在历史领域唯心主义永远只是有唯心主义的错误，而不会有机械论的错误。

陈文的第三个论点是，有些事物性质的变化并不是原来的矛盾主体双方的互相易位的结果，而是由旧的矛盾体被新的矛盾体所取代来实现的。例如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时，奴隶并没有转化到原来奴隶主所占据的统治地位上去，而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地位分别由地主和农民所取代。

我们知道，在奴隶制社会中，主要矛盾是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但是在那一种社会制度下，社会主要矛盾也不是始终不变的。尤其在社会制度转换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奴隶社会末期，开始出现了新兴地主阶级。这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主要是这一对矛盾斗争的结果（当然，新兴地主阶级胜利了奴隶斗争的力量）。封建社会末期的情形也是类似的。随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社会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旧的矛盾体被新的矛盾体所取代的过程。不能把这两种情形截然分开来。

综上所述，我们在考察现实的复杂的矛盾运动的时候，不能离开发展作静止的研究，离开联系作孤立的讨论，应当力求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对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是必要的，但是应当力求弄清该项理论的本来含义，研究科学性，以便肯定那些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那些应当否定的东西，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断得到发展。



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相互转化是普遍原理

朱伯崑

7月10日《人民日报》“问题讨论”栏发表陈进玉同志《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相互转化是普遍原理？》一文，该文提出哲学上一个重要问题，我想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和作者商榷。

陈文的一个论点是，矛盾主次双方的区分并不具有普遍性，有一些矛盾，其双方不能区分为主次。

陈文的一个论据是恩格斯的一段话，原文是：“正和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西——不管把哪方面当作正，把哪方面当作负，都是一样的，不仅在解析几何中是如此，在物理学中更是如此。”（《自然辩证法》第194页）作者想以此说明这一类矛盾的双方是“彼此相等”也就是绝对均衡的。这是违背恩格斯的原意的。《自然辩证法》中关于正和负、两极性的论述，是为了说明“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的对立和固定不变的界限”，矛盾具有同一性，“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同上书第190页），因此不要把矛盾双方绝对对立起来。恩格斯并不是认为对矛盾双方就没有差异，没有主次，他正是在这里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同一性，指出“真实的矛盾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同上书第193页）正和负这对矛盾，作为抽象概念，自然不能区分出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它必须联系到客观事物才有意义。例如，贷方为主，借方为负，贷方借出5元钱，为正5，借方借了5元钱，为负5。不能认为这正5和负5是没有主次的，贷方的正5掌握了主动的数量关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再以物理学中热量为例，增加热量为正，传出热量为负，正与负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特定含义的。在加温的情况下，热量增加，“正”是主要的；在冷却的情况下，热量减少，“负”是主要的。就是说在其运动过程中正和负有主要和次要的区别。主次双方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化。

陈文的另一个例子还是引了恩格斯说的，关于分析和综合，这两个中，我们“不应当偏重于把另一个提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在批判“归纳万能论”时说的，强调的是分析法和综合法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但恩格斯完全不是在说在实际应用中就没有主次。“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就是说有些问题主要用分析法，有些问题主要用综合法，不过是一个都要用到该用的地方。就在论述这种方法的时候，恩格斯还特别在页边上写道：“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它的对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了。”（同上

书第206页）这就说明了例如化学就是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科学。分析和综合的应用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也有主要的转换问题。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分析后综合，分析和综合二者不能分割，但总有主次有次。人类的认识史如此，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如果在考察问题的时候，离开了矛盾的特殊性，离开了矛盾存在的具体条件和具体表现，那就不仅无法区分出主次，而且亦无矛盾可寻。道理很简单，因为世界上的矛盾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作为具体矛盾，其双方发展总是不平衡的。而任何一对矛盾，如果拿掉其特性，都不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方面，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如此而已。这样一来，就连陈文所认可的“一些可以区分为主、次方面的矛盾也同样会化为乌有，例如，阶级斗争或对作战战士与人民的关系等等诸种条件和因素之后，才能得出何者处于优势，何者处于劣势，亦即区分出矛盾的主次方面，并由此对战争的发展及其结局作出正确的结论。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也用这种具体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正与负、分析与综合等等，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客观存在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形间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一论说，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

陈文的第二个论点是，有一部分矛盾的双方其作用反作用是质的不同，这一类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相互转化的，因此对他们使用“主要方面”或“次要方面”的概念是不科学的，也谈不上什么主次双方地位互换的问题。这，显然涉及到了《矛盾论》中的一段话的理解。

《矛盾论》中关于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段话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论述的是矛盾主

次双方依一定条件相互转化的普遍性的问题。这里所谓起主要的作用的方面，也就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里的“决定”的含意，不是本源或基础意义上的准决定论，而是指矛盾发展过程中哪一方起主导的決定性的作用。为叙述简便起见，我们也以物质与精神这一对矛盾为例。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有本源和派生的关系，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具有绝对的意义，是不能动摇的。但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止于此，正如列宁指出的，“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9—140页）什么是“相对的”？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转化。事实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是唯物论的论题，就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地位来说，当然谈不到转化，但是我们的唯物论是和辩证法统一的。当我们研究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时，如果仅仅看到对立的绝对性，否认转化，就只有形而上学而没有辩证法。陈文把第一性第二性这个有限的范围等大与物质与精神的全部关系，这就难免造成一系列的混乱。当然，我们同时必须指出，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为我们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是唯物辩证法。也正因此之故，《矛盾论》讲的这两个“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有“一般地表现为”和“在一定条件下之”的重要区别。唯物辩证法认为，第一性的东西在事物发展中一般地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第二性的东西则只在一定条件下才反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且，物质与精神的本源和派生的关系，贯穿于这两种情况之中。当着在一定条件下下精神的東西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时候，仍然是在物质决定精神的基础之上来谈这个问题的，精神的東西的作用，不是可以主观地任意地发挥的，而是由物质的东西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所以可以说，物质与精神这一对矛盾的双方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主次地位的相互转化，并不是第一性第二性的转化，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运动中各自的条件作辩证的分析，并不是违反唯物论，而正是以唯物论为前提的。陈文在论述经济和政治这一对矛盾的主次双方不能转化的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

